中大地理

又是一年杜鹃红



康乐百花丛，
三月花最浓。
赏花马岗顶，
莫负杜鹃红。

文/梁必骐

摄/张丽梅

风景如画的康乐园，园内几乎各个角落都可见到盛开的花朵，而且一年四季都是“离离野树绿生烟，灼灼山花烂欲然”。春天是百花争艳的季节，在康乐园也不例外，茂密的绿树丛中，无处不隐藏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鲜花，近日最吸人眼球的莫过于马岗顶的杜鹃花。今年映山红一如往年灿烂绽放，而且在马岗顶南坡更有四色杜鹃花竞相辉映，由此引来了一拨拨赏花的游人。

杜鹃花又叫映山红，原产于我国，是我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我国种植杜鹃花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唐代，她就与报春花、龙胆花合誉为“中国三大天然名花”。目前世界上有杜鹃花约900种，中国占530种，可称得上杜鹃花的王国。

“杜鹃”花鸟同名，杜鹃花开之时，正值杜鹃鸟啼之时，杜鹃鸟俗称布谷鸟，其叫声有如“播谷播谷”，故又名“催耕鸟”。相传杜鹃鸟声声啼叫直至呕出滴滴鲜血，洒落在漫山遍野便化成朵朵杜鹃花。对此一花一鸟，古人不仅写有许多赞美的诗词，还留下了不少动人的传说，如“杜鹃啼血，子规哀鸣”的典故便是其中之一。正因此，诗仙李白有诗云：“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杜鹃花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群花竞放，十分艳丽，故有“花中西施”之美称。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赞曰：“闲折二枝持在手，细看不似人间有，花中此物是西施，芙蓉芍药皆嫫母”。(注：据传，嫫母是黄帝之妻，貌丑而贤慧。)宋代诗人杨万里也有诗云：“何须名苑看春风，一路山花不负侬。日日锦江呈锦样，清溪倒照映山红。”

康乐园的杜鹃花约有60余年的种植历史。据闻，陈序经先生早在岭南大学时期就在马岗顶悉心移植和栽种了大批杜鹃花。虽经数十载风吹雨打，杜鹃花仍然生机盎然。在我印象中，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马岗顶，每逢杜鹃花盛开的时候，无处不是映山红的天下。可笑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位校领导说，康乐园的花花草草会吃人。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将大批杜鹃花挖出来移植到中大“五七”干校。后来马岗顶又新建一座图书馆，因此马岗顶就只留下数小丛杜鹃花，其中惟有大钟楼西侧的杜鹃花开放最旺盛。当年马岗顶的杜鹃花都是传统的映山红，花开时节红满山岗。现在马岗顶南坡的红、紫、粉、白四色杜鹃花应是上世纪80年代修建廖承志铜像时新种的。据当年的园林科杨金铨科长说，那时折枝采花的人不少，对杜鹃花破坏较严重，现在盛开的映山红和多色杜鹃花是经过园林工人不断补种和维护而保存下来的。可见今日康乐园的杜鹃花是来之不易的。

正是马岗顶的杜鹃花，让中大人同杜鹃花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大人喜爱杜鹃花，不仅表现在种花、赏花、护花，还体现于咏花、叹花、颂花，催生了校园花文化。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于1952年写的《咏校园红杜鹃》：“美人秾艳拥红妆，岭表春回第一芳。夸向沉香亭畔客，南方亦有牡丹王。”1965年，他又对杜鹃花有感而发，赋诗曰：“寻诗岁月又春风，村市飞花处处同。绝艳植根千日久，繁枝转眼一时空。认桃辨杏殊多事，张幕悬铃枉费工。遥夜惊心听急雨，今年真负杜鹃红。”中山大学校报先后陆续发表的有《美的召唤—我徜徉在图书馆旁的杜鹃花丛时》、《爱的呼唤》、《踏莎行》、《一花一鸟说杜鹃》、《杜鹃花》、《杜鹃花开说杜鹃》、《中大的杜鹃花》等多篇诗词和散文，咏叹杜鹃花。

近年来康乐园的杜鹃花年复一年绽放，似乎越长越茂盛，花朵越开越妖娆。今年虽遇较长时间的寒风细雨，但藏在绿叶中的杜鹃花依然笑逐颜开，妖艳迷人。但愿中大人发扬爱花护花的优良传统，让杜鹃花在康乐园开得更艳丽！

中山大学教育口述史

五旬仁心济黎民 中山辉煌桃李香

——记彭文伟教授与中山医学教育(三)

文/杨蕾 游澄 石旋

六、勇挑重担，恢复实力

1980年，正值“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上级和学校决定重新提拔有才能、有学问的专家参加领导班子的工作。1980年在党委主持学校工作的同时，由柯麟老院长(当时已经是卫生部的顾问)提名彭文伟担任副校长。

1983年底到1984年初，当时全国高校领导班子普遍面临新旧交替的问题，中山医学院也要选拔新的有才干的人才担任新一届的领导，而且当时的要求是在德才兼备的同时还特别重视新一届领导层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按照这样的要求，1984年4月彭文伟被任命为中山医学院的院长，任命书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签署，到5月正式上任。时任中山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卓大宏回忆说：“我记得当时彭校长接到这个任命的时候也比较振奋，同时也知道了刘希正同志在新班子里作书记。所以在正式上任之前请刘书记和我到他家里面吃晚饭，彭校长亲自下厨招待我们，交流今后的工作该怎样开展，大家情绪也比较高涨。”

上任之后彭文伟立即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明确学校办学的定位，调整办学层次结构和专业设置，他大力提倡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面对中山医专业实力的下降，彭文伟首先进行了教学方面的改革：第一个是倡导双语教学。所谓双语教学就是在用中文教学的同时，还采用英文教学，而且还挑选了一些英语基础好的专业学生成立了一个“全英班”(所谓“全英班”就是所有专业课程都是用英语教学的)。“全英班”能够培养出一批专业和英语都非常拔尖的本科毕业生，方便他们出国深造或在国内作为优秀师资继续提高。

第二个是引进PBL的教学，PBL就是problem based learning，意思就是基于临床课题的教学，先进行基础学习，然后是临床前期教学，而后就是临床的教学。这种学习提倡学生以自学为主，老师只是做启发式的讲解，学生要自学，泡图书馆；然后组织讨论，老师来做总结，这样获得的专业知识能够记忆牢靠，而且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也得以提升。1989年，国家教委、人事部和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授予彭文伟“全国优秀教师”的称号，肯定他在教学方面的突出成绩；1990年彭文伟的教学成果“自学为主的教学方法研究”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原中山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刘希正回忆说：“在这段时间，学校的各项工作协调发展，声望逐步恢复，科研工作取得新的突破，教学改革也有新的亮点，所有这些都为学校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彭文伟在担任校长期间，与刘希正书记一起，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中山医学院升格为中山医科大学，而且还成立了几个院系，包括基础医学院、卫生学院、护理学院等。1985年经国家卫生部批准，中山医学院改名中山医科大学。在校庆期间学校请邓小平同志题写校名，邓小平同志没有给其他任何一所高校题写校名，但是现在保留的“中山医科大学”六个大字却是邓小平的亲笔。这既和中山医在文革后迅速恢复实力有关，也和上世纪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人每年冬天来广州从化避寒疗养有关，当时彭文伟作为年轻的医生和教授也参与到中央首长保健的任务中。

七、对外工作，争取资源

在当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彭文伟也抓住这一发展机遇积极为学校争取一些海外的资源，帮助学校更好的发展。首先，彭文伟积极争取美国中华医学会(简称CMB)的支持，这是一个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项目，成立目的是专门资助中国医科院校的发展。彭文伟担任校长之后，大力推进这项工作，很快就与美国中华医学会取得联系，并且邀请CMB主席来中山医考察、讨论资助项目。CMB前后两任主席都先后来到中山医，通过实地调查，两次资助，帮助发展。

其次，彭文伟还积极联系国外高校，与多所国外学校建立起姊妹关系，互相合作和交流，与美国、英国、澳洲的大学，都建立起了联系，主要是培养师资力量，同时也在科研项目上合作。

第三，彭文伟还积极推动港澳和海外中山医校友会的成立，争取校友支持母校的发展。1987年彭文伟积极推动澳门校友会的成立。1992年香港校友会成立，虽然当时彭文伟已经没有担任校长一职了，但是香港校友会的筹备工作，彭文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于美国西部校友会的成立，彭文伟也积极推动，因为彭文伟在校友当中威望很高，他儒雅谦和的风度，很强的专业能力等都受到校友的敬重。

在对外交流的工作中，接待“奥比斯眼科飞机医院”一事不得不提。1982年，奥比斯眼科飞机医院要想飞到中国，必须得到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作为西方医学界第一架访问广州的专用飞机，中央指定中山医学院承担起全部接待责任，而当时的外事处长不懂英文，也不知道如何接待外宾，彭文伟勇敢地担负起接待外宾的任务，并将此次任务圆满完成。此后，中山医和彭文伟的名声大振，为他今后开展对外工作奠定了基础。1984年，彭文伟带领中山医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在美国参加新闻发布会时，不论是台上的美国教育界同行，还是台下一百多个新闻记者，都对彭文伟的英文赞不绝口，而且对他本人儒雅的风度和气质也很赞赏。

八、科研教学，硕果累累

彭文伟在担任中山医科大学校长之前，就在本专业(传染病学)科研和教学方面取得很大成绩。1980彭文伟担任校领导之后，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教学任务和专业科研。在教学方面的改革获得国家级的奖项，也培养了一大批医学界的人才。1983年，彭文伟就成为新中国第二批博士研究生导师，他培养了众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包括中国首次招收的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外籍医学博士生佩吉。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等众多的奖杯和荣誉，这些都是彭文伟一生辛勤耕耘的最有力见证。因教学及科研成绩卓越，彭文伟被选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远东及澳大利亚名人录》、及第八版《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

早在1955年，彭文伟就参与了现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原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病科早期的组建，一起为之努力的还有朱师晦、姚集鲁等教授。据刘希正老书记回忆说：“当时大家都说第三医院是中山医的‘西伯利亚’，很荒凉的地方，经过他的努力，三院的传染科得到很大改善，而且其他科也上去了，这和彭校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全文完)

关于“岭南双坟”及梁发其人其事议

文/罗汝材

2月21日《广州日报》(A13)载记者徐静一文“中国首位报人墓沉埋中大草坪下”，读后除增长知识、大开眼界之外，亦引发笔者的一些新的思考。

钟荣光先生是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一生对岭南大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墓碑和骸骨不知去向)来看，复原其墓似有困难，建议在中大岭南学院前或是其故居“黑石屋”前立碑纪念，似更合适。至于是否复原梁发墓或是立碑纪念，则有商榷之处。

其一，梁发是否“中国首位报人”，或称第一位“华人记者”、“第一华文报人”？据查，徐静文中提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英国传教士米怜在马六甲创办的。从1815年至1821年前后历时7年，均是由米怜编辑的，他是中国通，懂汉语。1821年，因米怜肺病恶化，难以主持编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遂告停刊。(参见拙稿“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早期的华文报”，载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学刊》第7期，1990年12月)。梁发，因家境贫寒，十五岁便前往广州谋生，先学制毛笔，后改学木板印刷。1811-1812年在广州刻印《路加福音》时开始与伦敦布道会派往广州传教的传教士马礼逊接触，受其影响，后接受施洗。1812年，米怜将他与蔡高二人，作为刻印工带往马六甲，如徐静文所述，协助米怜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此后，梁发一直担任该报的刻印工作，直至1821年。他从未主持过该报的编辑工作。

其二，《邸报》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哪一份是第一份华文报？前者是中国历代王朝政府编辑印行的类似公告的简报，公布一些政令及信息，最初内容较为简单，但毕竟是个“报”，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最初主要是宣传基督教义、传播一些宗教信息的月刊，内容同样粗糙、简单，与其说是华文报，不如说是杂志性月刊更恰当。后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加载了一些时事信息，比《邸报》是进了一步，但毕竟比《邸报》晚了很多年。《邸报》始创于西汉初期(公元前二世纪左右)，距今2000多年，自西汉至清代，从未中断过，直至1912年清帝退位，才告停刊。《邸报》不仅是中国最早的华文报，也是世界最早的报纸，比罗马帝国凯撒大帝在公元前59年创办的《每日纪闻》早了一个世纪。现存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邸报》是唐朝时期的，距今亦有1100多年。

其三，梁发与岭南大学没有什么联系，梁发在世时，岭南大学尚未成立。梁发在广州传教时，清政府以其“妖言惑众”的罪名加以拘捕、惩戒，并禁止其在广州传教，被迫返回马六甲。身后为何葬在岭南大学，这是一个谜。笔者猜度，此举可能是当时掌管岭南大学事务的基督教会所为。将最早在广州信教、传教的名人葬在岭南大学，不仅是个善举，或亦可提高岭南大学的知名度。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是否复梁发墓或立碑纪念，中大人需“慎思”。钟荣光先生与梁发是隔世之人。除编辑过《劝世良言》等一些宣传宗教的小册子之外，梁发并没有什么传世之作。钟荣光遗言身后葬于梁发墓旁，不见得是推崇后者，更重要的恐怕是该墓地位于他任职岭南大学时的故居“黑石屋”的前方，即徐静文提到的怀士园。这是块风水宝地，葬于此，则是“长作岭南人”矣。

20多年前，笔者在职时，新加坡大学及南洋学会的多位学者、友人访问中大东南亚研究所时，均曾向笔者询问梁发墓地在何处，笔者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今《广州日报》披露其下落，也算了结了一桩心事。

涓流成河

行走的历史学

——记历史学系小学期湖南桂东口述史之旅(六)

文/历史学系2009级 罗韵 于广 王亚楷 黄晓红 孙婷

9日

口述的最后一站——沙田镇

第五天，我们在桂东的最后一天了，何文平老师和赵立彬老师决定带我们去沙田镇。之所以要不怕颠簸，历经两个多小时的山路跑去那里，不仅因为沙田在近代工农革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其自古以来在经济上就具有着不可小觑的地位，甚至大于桂东县城。早上7点，我们坐大巴来到沙田，大概9点半左右到达沙田镇。当年，镇上有很多店铺，平时人来人往，逢圩时，更是熙熙攘攘，如今，虽可能不如以前那般热闹，但也算是其乐融融，一片和谐。我们先参观了雄伟的“第一军规”广场，当年的刀光剑影早已远去，军魂之光已深深融入了这片土地，我短时间内就有感知。旁边的万寿宫，也称江西会馆，原是江西同乡初来此处的落脚地。解放后，收回公有，1951年改建为中国人民银行沙田营业所，现是革命陈列馆。茂林修竹掩映处有一戏台，台前有圆形木柱一对，有楹联一副：“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新社会建设灿烂光明。”这副对联，我们已经在桂东见过好多次，还真是处处一派革命气象，这会馆和戏台是毛主席1928年率工农革命军在沙田活动时颁布“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八项注意)的遗址。10点左右，我们便开始在沙田镇开始了1个半小时的口述。

我们在口述过程中的成长

当我们走在今日沙田老墟狭窄的巷子里，看到昔日的街巷和些许牌坊还在。曾经矗立的牌坊，荣耀加身；而今变成平常百姓家的墙角石，有的甚至浸于污水沟；走在这鹅卵石依稀可见的巷道上，似乎可见昔日熙熙攘攘的人群，从这巷道穿梭，从事各种买卖的身影。一瞬间，仿佛又回到了历史的现场，耳边响起了叫卖的吆喝声。

我们第一站是沙田的文明旅店，在店主的介绍下，我们发现了黝黑的墙壁上红军当年留下的宣传画，这幅画现在还被挂在纪念馆里。店主给我们滔滔不绝地讲了好久，无论我们说到什么话题，他总是把焦点回到红军上来。如果是以前，我很可能会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受访者，获得了很多详细的历史信息。但经过这几天在桂东的采访，我开始学会分辨受访者所说的历史了。普通百姓作为受访者，他们口中的历史也并非是真实可信或者他们亲身经历的。以这位大约70岁的店主而言，他并没有亲身经历这幅画的诞生过程，他对这幅画的阐述很有可能是来自身边人，甚至是某些权威的解释和阐述。每年来沙田参观的人，都会听他将一番类似的话重复一遍。这对他也是最好的宣传。对于他讲述的信息，我们也大致知道了该如何把握了。

随后我们随机在路边进行采访，但是我们5个小组，居然没有一个小组能问出来沙田为什么叫沙田？可能镇上的老人们接受媒体的采访太多了，不管问什么，回答内容较为统一，对于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相关问题没有什么建设性的答案，所有的了解均是之前在其他村子里口述时便已了解过的，这有点颇让我们失望……不过好玩儿的是，有一组竟然跑到离镇子很远的地方去看宗祠，还免费坐了回拖拉机，看来我们大家都被何老师染上了“宗祠病”，一看到宗祠就想往里面钻……

再见！桂东

离开了沙田，在桂东的最后的一天多的时间里，我们还去普乐乡东水村参观了30年代工农革命军的兵工厂和医院，当然，现在已经看不出当年的结构了，屋子已显得破落，虽然屋子里早已不如从前，可是大家依然是饶有兴致地进去钻研着墙上仅剩模糊的文字，只是希望能发现什么，研究历史真的需要一股劲儿，越破的东西越喜欢，越旧的东西越想搞明白，真正做了，才会体会到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快乐。最后，我们来到了普乐乡堡下村，参观了桂东县最大姓氏郭氏的宗祠，在郭氏宗祠考察时，天下起了大雨，我们一边等待雨停赶路，一边在祠堂内听当地老人讲述村子和郭家的过去，如数家珍。也许是有了几天的考察和讨论，雨声中听“古”，似乎没有了以前的茫然，群山中桂东的历史画面又一次从脑海飘过，不再陌生。

第二天，我们途经郴州回广州，但是桂东的一切仍历历在目，相比郴州的繁华，我们大多数人貌似还是更喜欢那个大街上会出现悠闲小猪的朴素的小县城。

我们不禁会用“难忘”来形容这次桂东之旅。一路晕车的痛苦历程，顶着烈日行走田野，难忘；与身边的同学在充裕的行程中互相调侃、互相帮助合作、互相交流，难忘；得老师亲自带队，认真点拨指导，难忘；将课堂上的历史学的训练应用于现实采访，对历史有了真切的感觉，难忘。所有的难忘都化成记忆，历久弥新。以后每次想起这次桂东之行，我总是记得它带给我的震撼、启发和感动。

桂东很美，湘南很好，最后，我也想大声喊一句“我爱湘南，我爱中大，我爱历史！”

(全文完)

诗歌欣赏

爱你一生

文/传播与设计学院 李庆双

相逢，
或许是在缠绵的雨夜，
也许是在明丽的清晨，
我看到你眼里灿烂的春花，
你回眸中有我浪漫的秋月。

青春的日子还在疯长着，
美好的果实尚未成熟，
我等待着你三月的倾诉。

现在正是最好的季节，
我听到了春的欢呼，
所有的男生和女生，
都在发出澎湃的心声。

今夜，
让我们在星光里起程，
不求来世相逢，
只想爱你一生。

附记：2013年3月又是学院传统的男生节和女生节，这是少男少女们狂欢和表达情感的时季，今年节日的主题是“爱你一生”。有感于这样一个主题，特写诗一首，为学生们祝福，也纪念我逝去的青春。

本报编辑：彭楚裔 徐津阳 吴立坚　　编辑部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南校区大钟楼三楼　电话、传真：84111991　邮编：510275　　承印：广东南方报业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